

故事中的经济学

Economic Principles in L

王开震◎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ED PRESS

经济 (91) 目录 游在书后

故事中的经济学

Economic Principles in Little Stories

王玉霞 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事中的经济学/王玉霞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86-1968-2

I. 故… II. 王…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2066 号

故事中的经济学

GUSHIZHONG DE JINGJIXUE

著 者: 王玉霞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968-2/F·192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 代序 |

经济散文的来龙去脉

这些年来经济散文在神州大地盛行，而这门学问似乎是炎黄子孙独有。不单是指内地的。澳洲有个黄有光，台湾有个熊秉元，而香港则要数区区在下了。

是怎样搞起来的呢？有时是弗里德曼惹来的玩意。话说1976年弗老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出自夏威夷大学、任职于香港美银做研究师的侯连辉，于该年10月瑞典公布喜讯后，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投稿到香港的《信报》去。当时正在惨淡经营的林老总山木，慧眼识大文，不仅把文稿照登无误，还请侯夫子吃牛扒。士为知己者死，侯夫子是为吃了牛扒而继续动笔。不止此也，他还邀请了同学杨怀康加盟。大家写起来，参与的有梁海国，有罗祥国，有黄志光，一时间变得热闹了。

今天，不少人认为我是经济散文的“始作俑者”，是该文体的发明家。我当然万分高兴，但侯夫子说是他发明的，怎么办？

经济学者在公众刊物写文章，早有先例。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在美国《新闻周刊》写专栏，写得好，有口皆碑。但他们写的是经济评论，不是散文。在公众刊物以浅白文字介绍经济学说，侯夫子可能是天下第一人，而林山木的《信报》欢迎这种与时事新闻没有关系的学术性文字，也算是盘古初开的创举了。问题是侯夫子与阿康等人当年为山木写的文字，算不算是散文，倒是疑问。

我第一篇以中文下笔的文章，是《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第一条》，1979年10月发表于《信报月刊》。初稿由我口述，侯夫子与阿康笔录，再由我修改。该文是以普通常识解释经济理论的一个重点，不是散文。

4年之后，山木在他的《信报》替我起了一个名为《论衡》的专栏，要我每星期交稿两篇。我第一篇交出去的是《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也是阐释经济，不是经济散文。一路写下去，不是评论，就是阐释。读者赞赏颇众，批评也不少。主要的批评是我的中语文字来的生硬，读来像英语中译。为了这批评我决定更改文体，搬出古文来一下古今并用，与读者平起平坐，闲话家常，在不经意中才把经济要点放进去。

这更改的第一篇文章——《论衡》的第十一篇——是1984年1月6日发表的《邓家天下》。该文发表的那一天，我在港大办公室的电话从上班到下班响个不停。这使我知道《邓家天下》是命中了读者的要害。不知为何，但觉得公众刊物的经济文章应该那样写。今天回顾，《邓家天下》可能是盘古初开的第一篇经济散文。跟着同年2月11日发表的《卖桔者言》，读者吵得更热闹了。

1986年北京杨培新造访港大，我才知道我写的是经济学的一种新文体。我送给他《卖桔者言》的结集，他读后说：“从来没有想到经济学可以那样放开来写，你写的是散文，经济学从来没有散文这回事。”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科学怎可以用散文体下笔的？我们没有见过物理学的散文，没有见过数学、化学、生物学的散文。但经济学是可用散文体下笔的。这是因为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的生活与行为，以散文下笔，作者可以把感情放进去，写的真情实感，而感情的表达是散文的一个要求。

有了《邓家天下》与《卖桔者言》的经验，我写的公众文章自然地倾向于散文体下笔。不容易。写经济学之外的话题，谈天说地的，或写容国团，感情的表达还容易，但经济散文必须有一些经济要点在其中，写得好很困难。感情的流露，如果不是自然的，读者会觉得肉麻。

除了《邓家》与《卖桔》外，我自己比较满意的经济散文有《补鞋少女的故事——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与《给女儿上的一课——也是女儿给我上的一课》。有重要的经济论点，有感而发，放开来写，而又能写到与自己有关的人与事那方面去，要机缘巧合才可以写得出来。

有时牵涉不到感情上的事，有经济重点，以散文体下笔，人与事就要写得生动过瘾，或搞笑一下，或潇洒一番。《荒谬的定律——与林行止商榷》，写优劣二币，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有时难免也会因为过瘾而闯了祸。

香港有个林山木，成都有个高小勇。小勇在成都办《经济学消息报》，当然不能像山木那样大展宏图。但在网页的盛行压制着小规模的刊物之前，小勇物色了不少阐释经济学的写手，好些文章是散文体。其中写得最像散文的应该是王玉霞。

玉霞是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热门教授，学生爆棚的那一类。她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经济观察。我读到她写的一篇关于买黑市火车票的散文，就建议花千树考虑出版她的散文结集，也替她起了一个书名：《生活在经济中》。

是的，我认为要一般性地推广经济教育，散文体最有效。没有

方程式，没有图表曲线，少用术语，但必须有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有感而发地下笔，或起码放开来写，但求生动自然。这样处理，可读性高，浅白易懂，而如果写得顺理成章，其说服力也强。

数十年来，我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要不然，以我的天生品性，不可能不断地在这门学问上搞了数十年。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老师阿尔钦，而谈得来的经济学的师友都是为兴趣而搞学问的。这是我知的经济学，与今天所谓的“主流”是不同的。

张五常

2003年7月



|序|

女经济学家看世界

男女平等并不等于男女相等。男女在权利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但生理上的性别差异决定了他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与表述自己观点的方式不同。阅读陈忠实、陆天明这些男作家和张爱玲、陈丹燕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你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经济学家比作家要理性得多，但男女之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当男经济学家们关注经邦济世这类大事时，女经济学家更关注贫困与平等，她们比男经济学家有更多同情心。当男经济学家沉醉于逻辑推理和数学模型时，女经济学家更善于从生活小事中揭示经济学的真谛，她们比男经济学家有更敏锐的观察力。读过王玉霞女士创作的文章，你会对女经济学家的风格有更具体而深刻的了解。

王玉霞女士与她同时代的男经济学家一样经历了同样的奋斗，取得了同样优秀的成就，年纪轻轻的就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成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她优秀

的教学效果和论著证明了“巾帼不让须眉”。但作为女经济学家，王玉霞教授又有自己的特色。

所有经济学家都注重观察生活，用生活中的事例诠释经济学理论，国外的大牌经济学家如贝克尔、诺斯都写过这类书。但女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生活又有所不同。男经济学家不理家务，也很少与保姆打交道，女经济学家无论有多深造诣，妻子与母亲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她们与家务有不解之缘（连撒切尔夫人这样的铁娘子还亲自下厨做饭——即使是作秀，布莱尔也不会作这样的秀），也更了解保姆。这就有了王玉霞的《我的保姆经济学》。从保姆的收益和风险，到雇用保姆的思考，事事都极为真实，事事中都有经济学。只有确实有雇用保姆经历的女经济学家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王玉霞的文章中讲的都是作为妻子和母亲亲身经历的许多家庭琐事，但她讲出了这些琐事背后的经济学道理，就不是一般的妻子和母亲，而有了经济学家的身份。

女性的特点是感情细腻，所以女作家才能成为婉约派。婉约，没有气吞山河、大江东去的男子汉气派，却有感情真挚、体贴入微的女性温柔。许多人爱看女作家的作品，原因大概在于此。我本人就爱读张爱玲、毕淑敏、陈丹燕的作品。她们作品中流露出的那种似水柔情，给你一种享受。王玉霞《家中的经济学》中对丈夫与儿子的爱，《孝顺的“代价”》中对父母的爱等等都散发出这样的情感。如果说男人是用笔写作的，那么，女人更多的是用感情写作的。这种风格贯穿了整本书。

王玉霞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社会，包括公共交通、消费、法律、环境、生产与经营等等。她写的许多事情都是亲身经历的，例如，《北京寻医——“挨宰”的理性》中通过陪父亲看病的经历说明了信息不对称下消费者“挨宰”的无可奈何。这种事情是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要经历的，但王玉霞从中悟出了保护消费者与信息的关系。女性，即使是事业型女性，也往往比男性更关注生活，也

更重视生活。这正是她从生活小事中能悟出许多道理的原因。男人更关注大事，女人更关注小事，从小事悟出的道理让人读来更亲切，也更有味。

王玉霞女士有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又注意观察生活，思考其中的道理，再加上她清新、朴实、流畅的文字，就使得这本书极富可读性。散文讲究散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我的理解是散文要写得随意，信手拈来，放开来写，但其表述的思想意义都是明确的。散文要寓含义于行云流水的文字之中。张五常先生大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赞“国内经济随笔的写手中，写得最像散文的应该是王玉霞”。

与美国有10万经济学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学家并不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能坐下来读书、思考、写作的经济学家更不多。在这类经济学家中女经济学家更是少得可怜，大概是屈指可数的。王玉霞就属于这种极少数能坐下来读书、思考、写作的女经济学家。所以，当王玉霞请我为她这本书写个序时，我就不自量力地答应了。我想，这个序不仅是我读她的书之后的一些感想，也包含了我对身兼学者、妻子、母亲三重身份的女经济学家的敬仰。同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女经济学家给我们带来清新、温柔的凉风。

梁小民
2004年5月



故事中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资源配置的科学，是关于如何理性选择的科学，所以，它既与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等大事息息相关，也与企业的成本、利润、价格、产量密切相关。甚至普通百姓家长里短，生活琐事，也可以透过经济学的理性视角，显露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富有启发的侧面。经济学的历史虽然仅有200多年，但经济学的思想却源远流长。它起源于人类在适应自然、挑战自我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许多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道理，而通过故事讲授经济学也是钟情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业内人士的拿手好戏。本文就这两个方面，各举一例，以便与读者一起感受经济学的魅力。

1. 剥削：刘文彩VS周扒皮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刘文彩与周扒皮是南北两地知名度最高的地主。他们的故事，通过文艺作品的演绎与

夸张，在那个年代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虽然都是欺压穷人的“阶级敌人”，刘文彩与周扒皮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刘文彩是四川大邑县的大地主，良田万亩，且城里有工商业。改革开放前，名扬全国的泥塑群雕《收租院》，描述的就是刘文彩采取“大斗进，小斗出”来剥削农民，即借粮与收租时使用不同的计量工具。此外，他还私立公堂，将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水牢。四川大邑县内的许多穷苦农民，被刘文彩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周扒皮是小说《高玉宝》的作者高玉宝家乡，东北地区——的一个小地主。他剥削穷人的做法是“半夜鸡叫”，即夜半三更趴在鸡窝旁学鸡叫，目的是诱发公鸡鸣叫，发出天明的虚假信号，以便延长他雇用的长工下地干活的时间。

同为剥削穷人，为什么刘文彩与周扒皮的做法如此不同？作为地主，刘文彩与周扒皮在解放前均拥有一定的土地所有权。除自耕外，他们还有三种制度可选择。其一为雇用长工，地主与长工签订购买劳动的合约，长工获得固定的收入，地主承担全部的耕种风险并拥有完整的剩余索取权。在这种制度下，长工理性的选择是偷懒，因为他努力的结果全部归属地主。而地主则努力地进行监督，因为他百分之百地享有努力监督的结果。其二是地主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约，地主获得固定的收入，农民承担全部的耕种风险，并拥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若土地由一家农民承担，则这家农民的劳动投入必然是有效率的投入。因为努力耕种的结果百分之百归承租土地的农民所有。家庭亲情的纽带，使租地的农民无需监督便努力耕种。若合伙租种同一块土地，则租地农民之间会相互监督，这较地主监督更有效率。总之，较第一种合约，第二种合约对努力工作的激励更强。因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的监督成本。其三是分成制，即地主与农民签订分成租地合约，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耕地，秋后算账的依据是合约中的规定。按三七或四六不同的比例获取不同的收益。地主与农民分担了风险，分享了收益。地主既不可能像第二种合约那样高枕无忧，也不用像第一种合约那样“半夜鸡叫”。他只要对农

民的物资投入（如种子、肥料）及最终的产出进行监督即可。而农民的努力程度也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合约之间，因为他努力的结果只是部分地归自己所有。

面对三种合约的选择，为什么周扒皮选择了第一种合约，而刘文彩选择了第二种合约？假设周扒皮与刘文彩都有剥削的偏好，同样是理性的经济人士。他们不同的选择必有其经济学的道理。现分析如下：

首先，周扒皮是北方的专职小地主，而刘文彩是南方的兼职大地主。小地主处于原始积累阶段。除雇用长工之外，他自己还想亲力亲为地提供一部分劳动，在与长工共同劳动中降低了监督成本。且周扒皮是专职地主，没有城里的工商业需要打点，其监督的时间机会成本较低。此外，小地主雇用的长工数量较少，长工的劳动均在其有效监督的半径之中。而刘文彩则是进入享乐阶段的大地主，不可能去亲力亲为，且有城里的工商业需要打点。同时，由于占有的土地太多，监督需要委托代理，其效率必然低下，所以刘文彩采取一租了之的方案。当周扒皮采用“半夜鸡叫”延长长工工作时间以增加总收入时，刘文彩则采用“大斗进小斗出”的方式去盘剥农民。

其次，北方与南方有地域的差异。刘文彩地处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土地肥沃，自然灾害较少，即土地耕种的风险较少。因此，厌恶风险的农民有可能承担全部风险去接受承包土地的合约。而东北的土地虽然沃土千里，但自然气候的变化较大，灾年颗粒无收并不罕见，因此农民宁愿做长工而不愿去承担租地的风险。

最后，耕种品种的不同。南方多是水田及经济作物，而北方多为旱田及粮食作物。前者需要精工细做，劳动投入比较复杂，监督成本也高。而后者大田作物多采用粗放式耕作，劳动投入比较简单，监督成本较低，只要盯住种、铲、收几个环节便完事大吉。可见，刘文彩采取租地合约，周扒皮采取雇用长工合约与其所处的客观环

境关系密切。

由此可以推断，采用分成制合约的地主与农民所处的环境必然介于刘文彩及周扒皮之间。

周扒皮的“半夜鸡叫”与刘文彩的“大斗进小斗出”属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此道德风险完全可以因为其他守约的地主存在而得以避免，例如农民可以与刘文彩、周扒皮以外的较为“诚信”的地主签约。但是由于刘文彩与周扒皮处于垄断地位，或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地主集团采用了行为联盟，多而散的农民在讨价还价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因此受到了霸王合约的盘剥。只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爆发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才能使贫苦的农民得以解脱。最终刘文彩、周扒皮为他们的短期理性行为“半夜鸡叫”及“大斗进小斗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 鸡论：张维迎 VS 张五常

张维迎与张五常均是“真佛只说平常话”的经济学大家。他们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故事去演绎复杂的经济学理论。许多复杂的经济学理论，经过他们的诠释立即变得自然清新、通俗易懂。张维迎的学生曾在《经济学家茶座》上撰文，称他是“经济学界的大白话家”。我曾多次为张维迎教授的经典比喻拍案叫绝，例如他将国企翻牌改制的做法比喻成在马身上画白道，硬充斑马；将企业多元化的做法比喻成老太太上火车，带太多的包看不过来。在讲到政府管制时，他形容政府将市场机制这只猫打死了，于是耗子横行，政府又让人学猫叫吓唬耗子，无奈耗子越来越多，政府就认为学猫叫的人少了，派更多的人去学猫叫。他指出政府管制有自我强化的功能，提出要像戒毒一样戒掉政府管制的瘾。

2005年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生考试，有一道题是论述委托代理的问题。事后我的一个学生和我说起他是如何将委托代理中各种风险逐一描述分析的，如职业经理人的偷懒、灰色收入、在职消费、盲

目扩张等等。我对这个学生讲，委托代理问题你只答对了一半，委托代理者若只有风险没有收益，怎么会有委托代理关系长期存在？张维迎教授在《产权、信誉与政府》这本书中，用一只鸡的比喻将委托代理问题说得非常透彻。张维迎教授讲，为什么有委托代理，因为管理专业化有好处。犹如一只鸡在你手里一天只下一个蛋，在人家手中一天能下两个蛋，最好把鸡交给别人养，但是委托别人养鸡又要防范这个人可能会偷偷地炒鸡蛋吃，若难以避免他要炒蛋吃，也不要超过一个，否则不如自己去养，我的这番话让学生连连点头，借用经典的例子，节约了我很多教学成本。

去年，我去张五常教授家做客，恰逢教授正与复旦大学的几个博士生探讨如何撰写学术论文的问题，一只鸡到了张五常教授的手中又有了另外的意义。教授认为经济学主要的功能是解释现象，推测行为。例如有一家饭店，一元钱卖一只鸡，这个奇怪的现象就值得去解释。你要问，他为什么要大大低于成本提供一只鸡？为什么这是一只鸡而不是一只鸭？同是招揽顾客，饭店为什么不普遍降价，而是采用了一元钱一只鸡的做法？这两种不同的价格安排会有什么不同的激励？哪种安排更有效率？教授接着讲，在这家饭店，只吃鸡可不可以？购买10只鸡带回去可不可以？回答是不可以。一元钱一只鸡是卖广告，目的是连带销售其他商品，以争取较多的销售总额。

为什么是一只鸡而不是一只鸭呢？恐怕是偏好吃鸡的消费者远远多于偏好吃鸭的消费者，用一只鸡做广告更有一般性。接下来教授比较普遍降价安排与一元钱一只鸡的价格安排。普遍降价的做法从全社会角度看资源配置效率高，能够做到消费者吃鸡的边际效用等于饭店提供鸡的边际成本。对于一元钱一只鸡的价格安排，消费者消费一只鸡的效用只要高于一元钱，他就会继续消费，而饭店提供一只鸡的边际成本远远大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出现了资源配置非效率的现象。张五常教授关于鸡的分析，讲到这里，被复旦大学

博士们的其他询问打断了。

归来数日，我沿着张五常教授的思路继续分析，既然普遍降价的安排优于一种商品大幅降价的安排，为什么招揽定价现象在许多行业屡见不鲜？我的答案是，同样的让价额度，集中在一种商品上较分散在所有商品上更有视觉冲击力，更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更有广告效应。一元钱一只鸡既然是广告行为，它引发的成本收益变化必然不局限于鸡本身的交易中。虽然消费一只鸡的边际效用大大低于生产一只鸡的边际成本，但是它引发的其他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所创造出的生产者剩余，足以弥补售鸡交易中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效用的差额，否则实施一只鸡一元钱的饭店岂不关门大吉？

2006年9月



|目 录|

代序 经济散文的来龙去脉 张五常 VII

序 女经济学家看世界 梁小民 XI

引子 故事中的经济学 XV

|第一篇|家中的经济学 1

我的保姆经济学	3
家中的经济学家	7
太太经济学——信息少的收益	11
孝顺的“代价”	15
减负的神话	19
父亲的节俭悖论	27
家庭装修中的时间成本	31
市场演绎的脱贫手段	35

|第二篇|交通的烦恼 39

轿车进我家的前思后想	41
谁锻造了“马路杀手”？	45
自然自发的拼车制度	51
出租车合约的变迁——减租优于涨价	55
同城之内、画地为牢—— 大连市出租车市场分割现象的透析	61
票贩子的效率——发生在北京站的故事	67
除了抓阉，我们还能做什么	71
航空违约无商量	75